

社会情境中的控制感*

郭昫澄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要 控制感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近年来,研究者发现传统的控制感理论过分强调个体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中的限制因素(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现实因素)对控制感的作用。次要控制理论、可协商命运观和控制感补偿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情境中的个体控制感进行研究。次要控制理论主要强调在低控制情境下个体通过自身调节接受客观环境以获得次要控制;可协商命运观则认为亚洲文化下的个体在承认不可改变的环境作用的前提下依然坚持自己有限的能动性以此获得控制感;而控制感补偿理论则认为当个体处于低控制环境之中以致个体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通过一系列方式针对控制感缺失进行补偿。本文在对三种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对中国控制感本土化研究方向的思考。

关键词 控制感; 社会情境; 次要控制; 可协商命运观; 控制感补偿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个体行为由谁来决定,命运究竟在谁之手,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影响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心理学探讨的永恒主题之一(Hergenhahn, 2006)。心理学家们为此问题做出了诸多探讨和解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Rogers (1995)认为个体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行为的发生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个体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行为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结果,人的行为完全是由强化所决定的,个体对于行为的控制感则是虚幻的,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个人责任(Skinner, 1971);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认知学派看重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对情感、动机和行为的影响,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环境和个体认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otter (1966)的控制点理论(locus of control theory)认为个体内在的认知因素

通过对以往环境经验的加工,会形成一种对行为—结果的期望。当个体认为行为后所产生的强化不完全是其行为作用的结果,而是受命运、权力他人、以及环境中其他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时,就可以被看作是具有外控(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当个体认为强化是依随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并且和自身稳定的特征相联系,我们就可以认为此类个体具有内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内、外控个体在面对环境中的刺激时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和行为反应。

控制点理论的提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发展出了关于控制感的大量研究(Lefcourt, 1992)。White (1959)提出控制感实际上是个体胜任力(competence)动机的体现,个体对生活环境和事件的控制的需要是行为的首要动机(primary motive)。大量研究表明控制感可以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Ruthig, Chipperfield, Perry, Newall, & Swift, 2007),健康水平(Infurna, Gerstorf, Ram, Schupp, & Wagner, 2011),学业成就(d'Ailly, 2003; Gilman & Anderman, 2006)。控制感高的个体普遍被认为有较高的自主性和效能感,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逆境(Frazier et al., 2011)。而如果控制缺乏,将会导致诸如抑郁,退缩等一

收稿日期: 2011-09-1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项目批准号:71171094)。

通讯作者: 郭永玉, E-mail: yyguo@mail.ccnu.edu.cn

系列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 习得性无助是控制感缺失的极端表现(Burger & Arkin, 1980)。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传统的控制感理论过分强调个体对环境的改变和影响的能力而忽视社会文化环境对控制感的影响, Skinner (1996)在其对控制感结构的研究中提到: 研究个体控制感不仅要考虑个体的主观心理状态, 同时要考虑现实因素的影响。当个体面临重大疾病、灾难、社会变迁等低控制情境时控制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个体所生活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以及社会阶层会对个体的控制感产生怎样的影响? 次要控制理论、可协商命运观以及控制感补偿理论分别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释。

2 次要控制理论

2.1 次要控制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早期的控制感理论强调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一致性(contingency), 这些理论关注的是个体行为改变环境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例如: Seligman(1975)在习得性无助理论中提到个体的行为必须导致环境发生相应的改变才能使个体获得某种一致性; White (1959)在对动机理论的思考和总结中多次提到关于控制感的内容, 这些表述均强调个体影响环境的能力的重要心理意义。如果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持续体验到不一致性即会产生不可控制感(uncontrollability), 这就意味着控制感缺失。控制感缺失将会导致退缩、被动、顺从等行为的出现。而 Rothbaum 和 Weisz (1982)则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对个体生存环境的考虑。控制感的研究不能只强调个体努力改变环境来满足自身需要时所体验到的掌控感和胜任感, 这只是控制感表现的一个方面, 可以称作为首要控制(primary control); 相反, 控制感的获得还应该包括另外一种情况: 当个体处于一种低控制情境之中时, 自身的努力无法达到预想的结果和目标, 个体通过对自我的调节来努力接受现实状况并且适应环境, 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次要控制(secondary control)。因此, 控制感加工过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首要控制和次要控制。正如西方的一句名言所说: 上帝, 请让我能够改变可以改变的, 接受我不可以改变的, 并且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二者。虽然首要控制可以给个体带来成就感和满意感, 但是次要控制却可以使个体避免经历

太多的大起大落, 从而体会到更多的安全感。当个体的首要控制被环境所限, 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控制感就会丧失。次要控制会替代首要控制产生作用, 作为首要控制的补充, 次要控制同样可以使个体获得控制感。次要控制有四种表现形式: 预测性控制(predictive control)、幻想性控制(illusory control)、替代性控制(vicarious control)和解释性控制(interpretive control)。预测性控制是指, 在某些情境中个体认为自己能力有限, 为了避免失望而主动放弃或者退出对某件事情的参与; 幻想性控制认为个体将自身和机遇等强大的外部力量相联结从而获得控制感; 而替代性控制是指个体在某些不可控情境中通过和权力他人的联系来获得自身控制感; 最后, 解释性控制强调个体从情境和事件中寻求意义可以使其获得控制感。

Morling 和 Evered (2006)在对次要控制研究的回顾中, 强调次要控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除去对现实环境的接受之外, 还应该包含对自身的积极调节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次要控制的定义为: 次要控制是指个体主动调节和改变自身状态以接受环境事实的能力。次要控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环境的过程而是通过对自身状态的调节来对环境做出积极的评价, 从而达到适应环境的结果。目前研究中使用的压力应对问卷(Response to Stress Questionnaire-RSQ)(Connor-Smith, Compas, Wadsworth, Thomsen, & Saltzman, 2000)和首要-次要控制问卷(Primary-Secondary Control Questionnaire PSCQ)(Essau & Trommsdorff, 1996)两个问卷中关于次要控制的测量的题目可以稳定地反映出次要控制所包含的这两个维度。

Heckhausen 和 Schulz (1995)运用毕生发展理论探讨控制感的结构时详细阐述了首要控制和次要控制的关系。作者认为次要控制是个体在面对失败时所采取的一种缓冲的策略, 能够促使个体重新调整目标, 其最重要的功能能够更好地保持和提升首要控制, 使得个体可以从控制感缺失的状态中恢复, 进而投入到一个新的目标追求之中。另一方面, 个体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和挑战, 控制策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只有首要控制和次要控制达成一种最优化的平衡状态, 个体才能很好地应对压力情境(Heckhausen, 1997), 次要控制和首要控制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Heckhausen, Wrosch, & Schulz,

2010)。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首要控制的发展逐渐增加,在中年时期达到顶点,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水平会逐渐下降,而此时次要控制水平却依然上升,以弥补首要控制下降所带来的控制感威胁。上述观点将个体置于社会生活环境之中探讨不同年龄阶段控制感的发展和变化,强调个体控制感要受到发展环境的限制。Heckhausen 等人(2010)进一步提出,对个体控制感的研究要将个体的能动性与社会关系、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考虑在内,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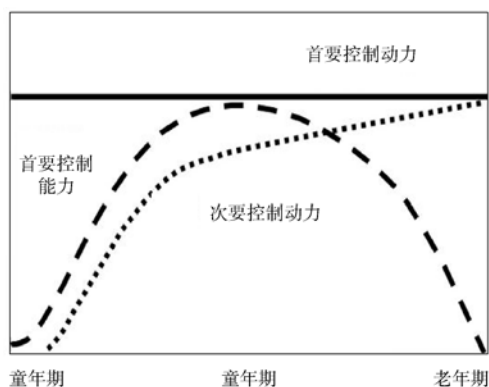


图1 首要控制和次要控制随年龄发展变化关系图
(Heckhausen, Wrosch, & Schulz, 2010)

2.2 次要控制的相关研究

次要控制理论提出后,研究者对其与个体的幸福感、健康以及压力应对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当个体处于低控制情境时,次要控制策略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应对,例如有研究者对190名79-98岁的老年人的任务相关的控制感进行研究,发现老年人在面对由年龄限制而导致的任务困难时,使用次要控制策略的个体比控制感缺失的个体的幸福感和健康水平要高(Haynes, Heckhausen, Chipperfield, Perry, & Newall, 2009); Chipperfield和Perry (2006)在对143名73-98岁的老年人的追踪研究中发现次要控制策略更能预测女性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研究推测这可能是由于老年的女性面临更多环境中的限制因素使得次要控制对其生活的影响力更大; Shapiro 等人(2011)也认为在疗病的过程中,如果病人能够积极地接受疾病现状会促使病人配合治疗,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和帮助,有益于病情的恢复;在对大学生的学习

活的纵向研究中也发现,当面对学业成功的情境时,个体会更多地表现出首要控制,在面对失败的情境时,则会转向次要控制(Hall, 2008)。

2.3 次要控制的争论

尽管次要控制理论研究得出很多一致性结论,不同的研究者关于次要控制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之处。争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次要控制是否属于控制感的研究范围;以及次要控制是否真的是“次要”的? Heckhausen 和 Schulz (1999)认为次要控制是面对环境限制时个体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个体的首要控制感,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或者历史时期首要控制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Gould (1999)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提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个体对于次要控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在东亚等不强调个体性的文化背景下,次要控制在个体的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者则进一步提出次要控制与首要控制是相互独立的,次要控制应该是以适应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控制为目的的,次要控制与首要控制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基本动机,首要控制体现出掌控和胜任动机,而次要控制则与亲密和归属动机密切相关(Morling & Evered, 2007)。与此同时, Skinner (2007)却认为这种说法已经偏离了次要控制原本的内涵,使其不再属于控制感的研究范畴。目前这些争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支持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

3 可协商命运观

3.1 控制感的文化差异及其解释

文化背景是控制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控制感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在北美和欧洲等强调个体文化的国家中,个体的控制感水平普遍高于东亚文化中的个体,东亚文化中个体则表现出更多的外控性(参见杨中芳, 2009; Gould, 1999)。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亚洲人的自主能动性比较低,比较相信命运的安排,更不愿意主动影响周围的人和事情(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随着次要控制理论的提出,研究者进一步解释亚洲文化下的个体更多的通过次要控制来获得控制感,次要控制通过个体自身调节来与环境达到一种和谐,这与其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更为一致(Azuma, 1984; Lam

& Zane, 2004; Peng, 1993)。虽然该种解释受到相应的实证研究支持,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能动性在亚洲社会中同样受到重视,只是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Bandura, 2002; Chiu, Morris, Hong, & Menon, 2000),华人在西方社会的成功事迹以及近年来亚洲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此种观点。那么,控制感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又该如何理解呢?

3.2 可协商命运观的提出

可协商命运观(negotiable fate)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社会文化环境中控制感的获取方式。和次要控制理论相类似的是,可协商命运观也提到传统控制感理论的片面之处在于过分强调个体行为结果之间的一致性而忽略了环境中的限制因素。因而研究者认为,个体的力量与环境中的因素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例如相信个体能动性的反面就是坚持宿命论;内控的反面就是外控。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折衷,即个体在承认环境中的因素会限制自身目标的达成,并且这种限制是通过个体的力量很难改变的同时,仍然可以在这种限制下发挥其自主能动性。甚至相信自己的努力付出可以感动命运,使得命运能够眷顾自己。这种对于环境和命运的观点就称为可协商命运(Gruschow, 2010),这种观点在中国的许多民谚中皆有反应,例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等。

那么,为何可协商命运观会在某些社会文化中流行是研究者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Au (2008)在跨文化研究比较中发现,相对于美国被试来说,中国被试对可协商命运观持更多肯定评价,而在同一种文化群体内,受教育少的被试比受教育年限长的被试,更赞成可协商命运观。另外一方面,赞成可协商命运观的个体认为这与主观能动性之间并不矛盾。赵志裕等人(2008)在模拟社会条件的实验中也发现当个体处在努力可以增加回报,但却受到社会选择的影响的情境中时,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可协商命运与主观能动性是相容的。这些研究表明个体所面临的社会限制可能是影响可协商命运观的重要因素。美国社会文化中强调自由、民主、对个人权利十分看重,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感知到的限制相对较少,因此也就有了所谓的“美国梦”的盛行;而中国社会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取向,个人的需要在很多时候需要服从人际、家

庭以及社会的要求(参见杨国枢, 2009),除此之外,民主法制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不完善等均给个体的生存环境造成诸多限制,因此,可协商命运观在中国被试中更为突出。而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说明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的个体(例如接受过更多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社会加诸在个体身上的限制,从而会减少可协商命运的信念。另有研究者在对印度低阶层妇女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认知能力后,受教育水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可协商命运观并且在图形判断任务中更倾向于做背景判断(Chaturvedi, Chiu, & Viswanathan, 2009),这与此前对亚洲文化下个体的认知方式研究结果相一致(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

4 控制感补偿理论

可协商命运观提示我们在面对环境中难以抗拒的限制因素时个体仍然坚持能动性以期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和保持个体控制感。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控制感对个体的心理意义不只在于能力和胜任,更在于抵御由情境中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并且满足其对结构和秩序的需要。当个体处于低控制环境中时,控制感会受到威胁并降低,随即情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使个体感受到焦虑,焦虑感进而驱使个体心理系统通过其他途径来恢复重建控制感,以重新获得秩序感和结构感,这种现象叫做控制感补偿(compensatory control)(Kay, Whitson, Gaucher, & Galinsky, 2009)。已有的研究发现控制补偿方式有个体知觉偏向、世界观防御、社会保障以及宗教信仰。

当个体的控制感受到威胁时,其知觉加工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产生一定的偏差来满足个体对秩序感和结构感的需要。Whitson 和 Galinsky (2008)的实验研究发现,当个体处于控制感威胁情境中时,倾向于将随机和没有关系的刺激知觉为有一个有意义及内在联系的整体。例如,控制感缺乏情境中的个体在结构需求量表中的得分更高;在图片知觉任务中更容易将无意义图片知觉为特定的物体图片;更倾向于将本来没有联系的两件事情判断为有因果关系;将无充分联系的负面描述归结于导致失败的原因等。研究提出加强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可以对此起到调节作用。Sullivan 等人(2010)在敌对关系研究中指出,

经历控制感威胁的个体倾向于夸大敌对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并且更加相信敌对他人的阴谋是导致生活中负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世界观防御被认为是个体在面临恐惧、焦虑负性情绪时会强烈捍卫自己所认同的世界观的心理现象,恐惧管理理论以及死亡提醒效应对此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傅晋斌,郭永玉,2011;郭永玉,傅晋斌,2011;刘亚楠,许燕,2010),而近来有研究指出世界观防御同样是控制感补偿的一种形式,相比于其他理论对世界观防御的解释,控制感补偿理论认为控制感威胁可以导致个体更加捍卫其原先认同的关于结构和秩序方面的世界观(例如,“为了使社会生活更加美好,人们都应该遵守相应的社会规范”等)(Shepherd, Kay, Landau, & Keefer, 2011)。

系统公正理论认为系统公正机会促使个体支持现存的社会体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相当数量的研究证明系统公正动机在低地位群体中表现地更加突出(参见李琼,刘力,2011)。控制感补偿理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个体通过外在系统的秩序和公正来弥补自身缺失的控制感(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 Laurin, 2008; Kay, Shepherd, Blatz, Chua, & Galinsky, 2010; Kay, et al., 2009)。Sullivan 等人(2010)发现当控制感受到威胁的个体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秩序良好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中时,可以降低个体的敌对心理;Kay 等人(2008)的研究中也发现个体的控制感和对政府责任感的偏好呈负相关,亦即个体的控制感越低就越希望政府更多地参与到个人的生活中来;但是政府的亲民度会影响到这种关系,当个体认为政府的政策不够清明或者腐败严重时,这种补偿作用将消失。

宗教信仰反映出个体对上天或者神明等超自然世界的强大力量的敬畏和膜拜。关于宗教信仰与控制感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研究者认为宗教之所以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在于宗教可以增强个体的控制感(Jackson & Bergeman, 2011)。宗教信仰使个体感到任何事件的发生不论好坏都不是由运气使然,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样使得个体的控制感受到威胁之时,会转而依靠宗教来获得补偿(Kay, Gaucher, McGregor, & Nash, 2010),而宗教中强调神明对生活中事件的控制的信念的补偿作用最为明显(Kay et al., 2008)。有研究发现

当社会保障系统失去补偿作用之时,个体会依然坚持宗教对控制感的补偿作用(Kay, Shepherd, Blatz, Chua, & Galinsky, 2010)。研究表明个体处于低控制感并且使其焦虑的情境中最为相信控制型神明的存在,而如果引导被试将焦虑情绪归为其他原因而非控制感威胁所产生,那么补偿将不会发生(Kay, Moscovitch, & Laurin, 2010; Laurin, Kay, & Moscovitch, 2008)。

控制感补偿理论为控制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基础,将个体的心理加工与现实情境紧密结合,对当今社会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心理学解释。因此,可以说此理论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冲突加剧等多种不确定因素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恐怖主义和国家民族偏见等问题确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控制感补偿理论提示我们可以从个体的控制感作用的心理机制来理解这些问题。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下仍可以使个体保持控制感,如何利用外在力量,如:宗教、政府的惠民管理政策消除个体在控制感受到挑战时所产生的心理不适,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5 小结与展望

5.1 小结

次要控制理论、可协商命运观和控制感补偿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情境中的控制感表现形式。三种理论在传统的控制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延伸,同时弥补了其不足之处,使控制感研究内容更为丰富,视角更为广阔。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种理论有其共通之处,例如都认为个体控制感和社会情境因素存在相互作用,控制感研究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多种情境因素。而在共同点的背后,三种理论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理论基础存在差异,次要控制理论和可协商命运观中对控制感的研究是建立在社会认知理论中胜任感、能动性和掌控感等核心概念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控制感补偿理论则是以存在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强调秩序感和结构感对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其次,三种理论的文化背景不同,控制感补偿理论和次要控制理论均是以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可协商命运观是以东亚文化为研究背景。虽然在次要控制理论

中也涉及到对亚洲文化的思考但是依然是以西方文化视角作为背景, 因此研究存在争议之处。再次, 三种理论对情境中控制感的解释侧重点不同, 次要控制理论和可协商命运观侧重研究个体在面对低控制环境时如何改变自身的认知去顺应和接受环境并最终适应环境, 控制感补偿理论则突出低控制环境中, 个体是如何寻找补偿控制感的途径以最终达到心理平衡。

尽管对控制感的研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积累, 但是本文所涉及到的三种理论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 理论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 对控制感本身的内涵和定义还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说法, 对个体心理特征考虑的并不充分, 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等等。

5.2 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对控制感的研究数量有限, 研究多围绕着传统的控制感理论展开。例如内、外控倾向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个体控制感的心理机制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在对情境中的控制感理论的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几点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控制感研究的可能的方向。

第一,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个体控制感的含义。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对某一心理的理解和表现不尽相同, 例如, 日本研究者发现日、美两国对能动性(agency)的理解存在差异(Markus, Uchida, Omeregíe, Townsend, & Kitayama, 2006), 而宗教在美国和韩国文化下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影响意义(Sasaki & Kim, 2010)。控制感是西方文化下重要的心理变量, 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个人在环境中的独特性, 强调个体的力量。正如西方研究认为首要控制对个体生存才是最为重要的, 而次要控制终究是暂时和次要的(Heckhausen & Schulz, 1999)。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强调个体与环境的融合性, 亦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追求自然本真”, 这种文化会影响到中国人人格的形成(涂阳军, 郭永玉, 2011)。那么控制感在中国文化下的含义又如何, 有哪些成分与西方的定义相一致, 又有哪些是我们社会中所独有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第二, 将控制感研究放在现实社会背景中。当今中国社会变革剧烈, 传统和现代元素在碰撞的同时又存在融合, 中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

样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个体的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 例如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个体的自由选择机会增多,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社会阶层凸显, 价值体系多元化等等。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变革会给个体的控制感和能动性带来影响(Evans, 2002, 2007; Tomasik, Silbereisen, & Pinquart, 2010)。另一方面, 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个体在面对这些社会现实时心理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表现。一些研究者发现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中, 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的个体认知方式存在差异(Knight & Nisbett, 2007; Kraus, Piff, & Keltner, 2009; Na et al., 2010)。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来看, 将社会变革情境和社会阶层等因素纳入控制感的研究之中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 在大文化背景下探究各种亚文化群体的控制感特征。在同一种大文化背景中, 不同年龄、地域、收入水平、社会阶层、职业类型、受教育水平的个体会形成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近年来, 一些研究者开始对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控制感进行研究。Heckhausen 等人(2010)提出控制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青少年群体的首要控制表现更为突出, 而老年群体的次要控制表现更为明显; Kraus 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的控制感水平不同, 高社会阶层的控制感水平高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 受教育水平对控制感的影响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研究发现低教育水平的印度妇女比高教育水平的印度妇女更加赞成可以加命运, 而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则更为支持个体能动性的观点(Chaturvedi, Chiu, & Viswanathan, 2009)。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差异逐渐加大。例如, 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信念与价值观差异显著, 形成所谓的“70后”、“80后”、“90后”的划分; 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贫困地区的差异扩大; 不同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群体的差异明显。因此, 研究各种亚文化群体的控制感特征是中国社会背景下控制感研究的重要思路。

第四, 运用多种范式对控制感展开研究。目前对次要控制和可协商命运观的研究主要基于问卷的方法, 对控制感补偿的研究多采用实验室情境模拟的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注意采用多种

研究方法。其中可协商命运观问卷的编制提示我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要注意结合我国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因素来考虑和设计,使得研究内容能更加贴近中国被试的社会生活从而反应出中国被试的个体控制感的机制。

参考文献

- Hergenbahn, B. R. (2006). *心理学史导论* (郭本禹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傅晋斌, 郭永玉. (2011). 死亡提醒效应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 34(2), 461-464.
- 郭永玉, 傅晋斌. (2011). 死亡提醒效应: 概念、测量及来自多领域的证据. *心理学探新*, 31(2), 113-117.
- 李琼, 刘力. (2011). 低地位群体的外群体偏好. *心理科学进展*, 19(7), 1061-1068.
- 刘亚楠, 许燕, 于生凯. (2010). 恐惧管理研究: 新热点、质疑与争论. *心理科学进展*, 18(1), 97-105.
- 涂阳军, 郭永玉. (2011). 道家人格结构的构建.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7(1), 18-24.
- 杨中芳. (2009). *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论文集*.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 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之间的关系? 见 杨宇 (主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四辑, p. 15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国枢. (2008)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 社会互动的观点. 见 杨宜音 (主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一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u, E. (2008). *Negotiable fate: The belief, 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Azuma, H. (1984). Secondary control as a heterogeneous categ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9), 970-971.
- Bandura, A. (2002).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cultural context. *Applied Psychology*, 51(2), 269-290.
- Burger, J. M., & Arkin, R. M. (1980). Prediction, control,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3), 482-491.
- Chaturvedi, A., Chiu, C., & Viswanathan, M. (2009). Literacy, negotiable fate, and thinking style among low income women in Indi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0(5), 880-893.
- Chipperfield, J. G., & Perry, R. P. (2006). Primary-and secondary-control strategies in later life: Predicting hospital outcomes in men and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25(2), 226-236.
- Chiu, C., Morris, M. W., Hong, Y., & Menon, T. (2000). Motivated cultural cognition: The impact of implicit cultural theories on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varies as a function of need for 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2), 247-259.
- Connor-Smith, J. K., Compas, B. E., Wadsworth, M. E., Thomsen, A. H., & Saltzman, H. (2000). Responses to stress in adolescence: Measurement of coping and involuntary stress respons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6), 976-992.
- d'Ailly, H. (2003). Children's autonomy and perceived control in learning: A model of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1), 84-96.
- Essau, C. A., & Trommsdorff, G. (1996). Coping with university-related problem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7(3), 315-328.
- Evans, K. (2002). Taking control of their lives? Agency in young adult transitions in England and the new Germany.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5(3), 245-268.
- Evans, K. (2007). Concepts of bounded agency in education, work, and the personal lives of young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2(2), 85-93.
- Frazier, P., Keenan, N., Anders, S., Perera, S., Shallcross, S., & Hintz, S. (2011). Perceiv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rol and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4), 749-765.
- Gilman, R., & Anderman, E. M. (200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levels of motivation and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academic functioning among older adolescent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4(5), 375-391.
- Gould, S. J. (1999). A critique of Heckhausen and Schulz's (1995)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3), 597-604.
- Gruschow, K. D., Au, E. W. M., & Liao, H. Y. (2010). *Culture as lay personal belief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N. C. (2008). Self-regul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in achievement settings: A process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7(10), 1126-1164.
- Haynes, T. L., Heckhausen, J., Chipperfield, J. G., Perry, R. P., & Newall, N. E. (2009).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8(2), 165-197.
- Heckhausen, J. (1997).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across adulthood: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of age-related challeng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1), 176-187.
- Heckhausen, J., & Schulz, R. (1995). A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2), 284-304.
- Heckhausen, J., & Schulz, R. (1999). The primacy of primary control is a human universal: A reply to Gould's

- (1999) critique of the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3), 605–609.
- Heckhausen, J., Wrosch, C., & Schulz, R. (2010).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1), 32–60.
- Infurna, F. J., Gerstorf, D., Ram, N., Schupp, J., & Wagner, G. G. (2011). Long-term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perceived control. *Psychology and Aging*, 26(3), 559–575.
- Jackson, B. R., & Bergeman, C. (2011). How does religiosity enhance well-being? The role of perceived control.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3(2), 149–161.
- Kay, A. C., Gaucher, D., McGregor, I., & Nash, K. (2010). Religious belief as compensatory contr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4(1), 37–48.
- 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 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1), 18–35.
- Kay, A. C., Moscovitch, D. A., & Laurin, K. (2010). Randomness, attributions of arousal, and belief in God.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2), 216–218.
- Kay, A. C., Shepherd, S., Blatz, C. W., Chua, S. N., & Galinsky, A. D. (2010). For God (or) country: The hydraulic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instability and belief in religious sources of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25–739.
- Kay, A. C., Whitson, J. A., Gaucher, D., & Galinsky, A. D. (2009). Compensatory Control: Achieving order through the mind,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heave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264–268.
- Knight, N., & Nisbett, R. E. (2007). Culture, class and cognition: Evidence from Italy.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7(3-4), 283–291.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6), 992–1004.
- Lam, A. G., & Zane, N. W. S. (2004). Ethnic differences in coping with interpersonal stressors: A test of self-construals as cultural mediato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4), 446–459.
- Laurin, K., Kay, A. C., & Moscovitch, D. A. (2008). On the belief in God: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motional substrates of compensatory 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6), 1559–1562.
- Lefcourt, H. M. (1992). Durability and impact of the locus of control constru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3), 411–414.
- Markus, H. R., Uchida, Y., Omoregie, H., Townsend, S. S. M., & Kitayama, S. (2006). Going for the Gold: Models of agency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contex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2), 103–112.
- Morling, B., & Evered, S. (2006). Secondary control reviewed and define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2), 269–296.
- Morling, B., & Evered, S. (2007). The construct formerly known as secondary control: Reply to Skinner (2007).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6), 917–919.
- Na, J., Grossmann, I., Varnum, M. E. W., Kitayama, S., Gonzalez, R., & Nisbett, R. E. (2010).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not always reducible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14), 6192–6179.
-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 291–310.
- Peng, Y. (1993).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in American and Chinese-American adults: Cross-cultural and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 Rogers, C. R. (1995).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 New York: Mariner Books.
- Rothbaum, F., & Weisz, J. R. (1982). Chang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self: A 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1), 5–37.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 Applied*, 80(1), 1–28.
- Ruthig, J. C., Chipperfield, J. G., Perry, R. P., Newall, N. E., & Swift, A. (2007). Comparative Risk and Perceived Control: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7(4), 345–370.
- Sasaki, J. Y., & Kim, H. S. (2010).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ligion's implications for secondary control and social affili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 401–404.
- Seligman, M. E. P. (1975). *Helplessness: On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death*. WH Freeman/Times Books/Henry Holt & Co.
- Shapiro, J., Astin, J., Shapiro, S. L., Robitsek, D., & Shapiro, D. H. (2011). Coping with loss of control in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Families, Systems, & Health*, 29(1), 15–28.
- Shepherd, S., Kay, A. C., Landau, M. J., & Keefer, L. A. (2011). Evidence for the specificity of control motivations in worldview defense: Distinguishing compensatory control from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nd terror

- manage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5), 949–958.
- Skinner, B. F. (1971).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New York: Knopf.
- Skinner, E. A. (1996). A guide to constructs of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3), 549–570.
- Skinner, E. A. (2007). Secondary control critiqued: Is it secondary? Is it control? Comment on Morling and Evered (2006).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6), 911–916.
- Sullivan, D., Landau, M. J., & Rothschild, Z. K. (2010). An existential function of enemyship: Evidence that people attribute influence to personal and political enemies to compensate for threats to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3), 434–449.
- Tomasik, M. J., Silbereisen, R. K., & Pinquart, M. (2010). Individuals negotiating deman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A control-theoretical approach. *European Psychologist*, 15(4), 246–259.
- White, R. W. (1959). Motivation reconsider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66(5), 297–333.
- Whitson, J. A., & Galinsky, A. D.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322(5898), 115–117.

Perceived Control in the Social Context

GUO Xu-Cheng; GUO Yong-Yu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Perceived control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a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psychology domain.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foun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erceived control overemphasized the individual ability having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 but neglected the objective social context (eg, social political conditi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ffect and life reality) which may exert impact on the personal perceived control. Primary-Secondary control theory, Negotiable fate, and 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 have elaborated how perceived control varied in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 respectively. Primary-Secondary control theory claimed that the person in the low-control situation should adjust oneself to accept the environment unchangeable and acquire a kind of secondary control. Negotiable fate believed the person in the East-Asia culture context would admit the restrain factors in their life but still persist the personal bounded agency in order to master their life. 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 held the perspective that when people face the low-personal control circumstances, they would try to gain perceived control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ensatory ways. Some directions proposed based on these theorie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ideas of further researches of Chinese perceived control.

Key words: perceived control, social context, primary-secondary control theory, negotiable fate, 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